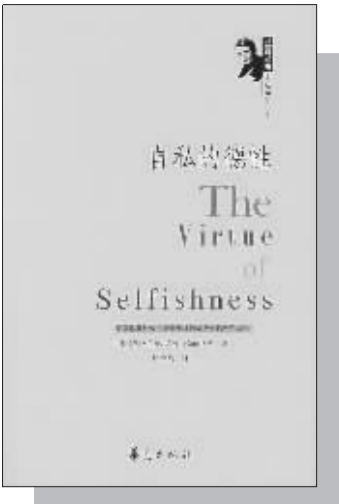


Book



《自私的德性》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安·兰德等著
焦晓菊译
华夏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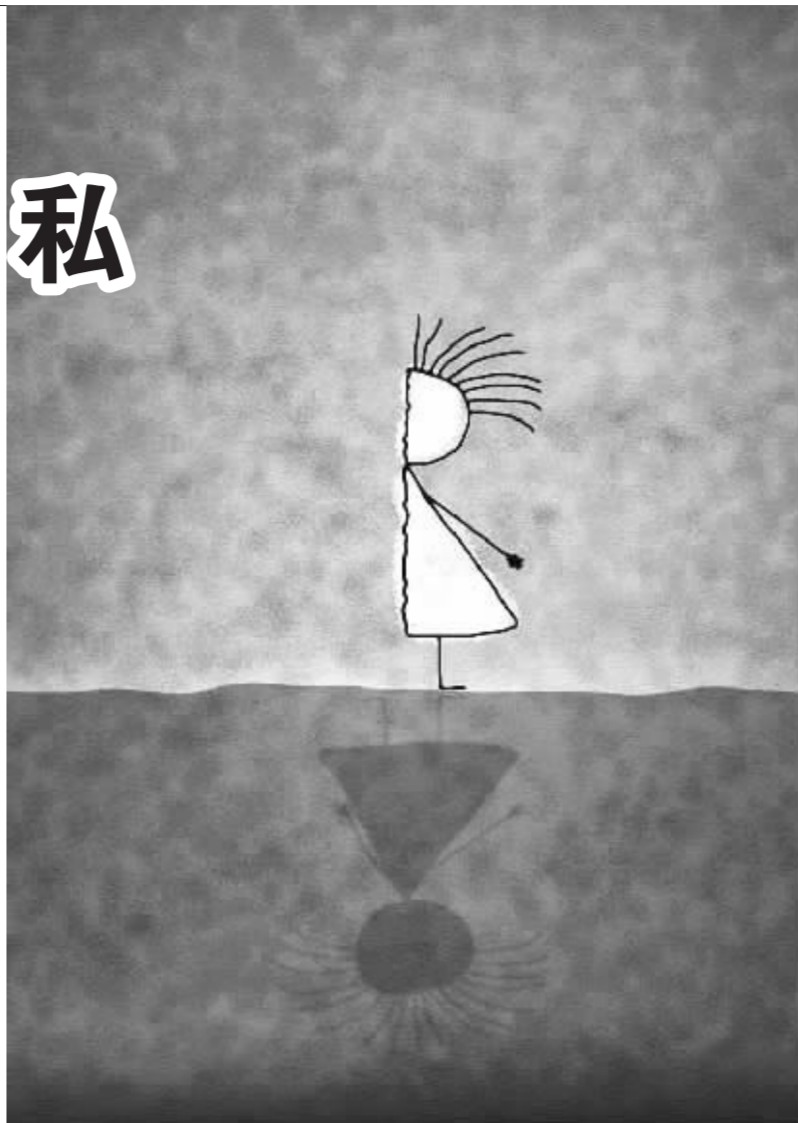
人应当关心、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美德。这样的道德箴言,听起来的确惊世骇俗。这样的教诲出自一位女人之口,尤其令人震惊。她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俄国革命时期逃亡到美国,并且很快就成为自由市场及其伦理基础最为坚定的辩护者,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就是安·兰德(Ayn Land)。听起来,这似乎是中国民间社会久已流传的格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兰德就根本算不上是哲学家了。实际上,当兰德谈到自私的时候,对自私的主体——个人,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兰德会追问:你所谓的利益,真



的是你自己的正确的利益吗?她说:“正如人不能通过任何随意的方式生存下去,而必须发现和实现其生存所需的原则,同样,人的私利也不能取决于盲目的欲望或者随意的奇想,而必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找到和实现私利”。自私成为美德的前提是理性。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她的这种伦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古希腊伦理学特征,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都非常强调理智、理性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会有真即是善的格言。当然,兰德是一个个性十分强烈的人物,她可能从来没有明白地说出自己的伦理学历史渊源。但是,兰德这样的自私观让普通人有点沮丧。一个人首先得是一个具备十分清醒、有能力认识到客观真理的理性人,才有资格宣称自己知道怎样自私。要做一个真正自私的人,必须十分理性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并且始终理性地选择。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如果达不到兰德所设想的那种程度,他大约就不配谈论自私。一个人一旦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让自己的行为受某种盲目的欲望或奇思怪想支配,那这个人的自私就一点都没有美德可言了。应当说,兰德坚持了启蒙运动(即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人的理性能力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她坚

正确的自私

信,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的,是可以分辨出自己的行为之好坏、对错的。但是,这样的信念,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依据常识就可以知道,大多数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即使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十分出色,也未必能够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举个例子: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企业家基于理性计算发现,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管制官员,获得对于该规则的豁免权。但,这能够算兰德所说的合乎美德的自私吗?很难。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规则本身,相反,假如所有企业家都机灵地选择这种策略,那很可能使这项不合理的规则永久化,甚至官员索要的贿金数额会提高。这一结果显然有损于企业家的自私。那么,企业家当初选择购买官员,是理性的吗?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十分常见,它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理性”在个人选择过程中的局限性。仅靠个体的理性计算,未必能够保证个人做出“正确的自私”决策。因为,个体的理性计算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相反,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宗教、道德教化会发挥十分重要的功能。还是回到上面说到的故事:假如企业家接受了某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告诉他,自由地从事某种活动乃是自己的自然权利,贿赂官员的行为本身是不正确的,那么,大多数企业家就会把这种应对策略排除在策略选项集之外。由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另外的策略,比如,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抗争,通过司法、政治等途



径,要求废除这种不合理的规则。这种策略看起来难度更大,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较小,而且,即使成功,也必然会有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不过,假如企业家的信仰给了他道德勇气,那他就能选择这种短期看起来不合理的策略。当然,这种策略最终的结果将会十分可取,至少个人免除了日益沉重的贿金负担,更不要说,整个企业界都因此而获得了正的外部性。由此可见,企业家的信仰及信仰中所包含的道德约束,其实大大地拉长了企业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时间

尺度,甚至改变了他计算的方程,从而使他的决策从长远来看,对于自己的利益来说,更为正确。因此,很多学者说,在道德、宗教信仰、习俗中,其实包含着超越个体理智能力的智慧,这些智慧使得个人不需要思考,即可选择对个人的长远利益来说最为有利的策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当然,兰德所说的理性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它们都是要解决利己而不损人的伦理难题。只不过,两者的解决路径不同。

强权悖论:以和平名义发动战争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
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美)托马斯·巴尼特著 王长斌 汤学武 谢静珍译
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葛传红

当冷战在上世纪末终结之后,善良的人们以为“永久和平”可以到来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人们相信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家因此提出了解释这个世界的宏大理论,诸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著名新闻记者卡普兰的“乱世将来临”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等。这些理论虽足以振聋发聩,但却往往解释不足。作为美国战略中心的五角大楼为此忧心忡忡,多年来一直在组织人员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军队改革办公室”战略未来助理托马斯·P·M·巴尼特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他石破天惊地提出的“五角大楼新地图”宏大理论,似乎成了美军下一代军事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蓝图。早年曾经在哈佛大学教过马克思主义的巴尼特,最早的研究领域是前苏联,是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1991年苏联解体后没过多久,他便“转业”未来战略研究。先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Navy War College)任高级研究员和教授,后又出任美国国防部“战略未来助理”,成了五角大楼的高参。2004年,这本《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出版后,巴尼特在美国政界声名鹊起。说这本书是在预测和解释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性质一点都不过分。可以说巴尼特在托马斯·弗里德曼、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工作的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全书清晰地描述了美国最近的军事历史和战略,总结了美国在建立国际稳定秩序中能够而且将要起的独特作用,综合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入木三分剖析全球化。对于任何理解伊拉克、阿富汗的现在和未来的人,对于任何想理解当今世界现实的人,《五角大楼的新地

图》都是一把开启大门的钥匙。巴尼特的理论来源于全球化,他认为在冷战后,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核心国家”(Functioning Core),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整合,包括北美洲国家、南美洲大部分国家、所有欧盟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日本以及亚洲的新兴力量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是核心国家)、印度和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据了40亿;剩下的大多属于“断层国家”(Non-Integrating Gap),这类国家要么拒绝融入主流国际社会,要么因为没有中央政府或种种内部危机无法融入国际社会,包括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南非以外的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国家、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等等。这些“断层国家”是滋生苦难、压迫、恐怖主义、疾病的温床,对美国和世界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冷战后美国介入的大多数国外军事行动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巴尼特认为,要最大程度地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影响,一方面要扩大“核心”国家范围,增强它们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缩小“断层”层”,将位于“断层”的国家纳入全球化的网络,从根本上破坏恐怖主义的温床。然而,长期以来,美国却抱着乔治·凯南的“冷战思维”不放,数十年如一日地先后将苏联、欧盟、日本和中国当成是威胁,顽固地坚守着那套“寻找敌人”的战略,直到“9·11”悲剧发生。在发展“核心”和遏制“断层”的思维下,巴尼特主张中美之间必须建立稳定而长远的战略互信;追求双赢,要寻找共同的利益。在这点上,巴尼特认为,太多的美国领导人在对待中国时,仍将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威胁和敌人,而中国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在美国的战略中占有中心地位,“未来中国将不仅是规则的遵守者,而且将是规则的制定者”。不得不指出的是,巴尼特所说的“中美友好”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前提的,其着力点在于要缩小和孤立“断层地区”,希望中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反恐大业”。在他眼

里,“断层地区”是自绝于全球化进程的紊乱地区,不过是一些“失败国家”,完全还处在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社会之中。因此,面对这样的世界,美国需要一种“利维坦”式的军队,由潜艇、远程轰炸机和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要在这些断层地区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为此,他大胆提出10条建议,即他心目中的“五角大楼新地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整肃“邪恶轴心”国家,即重建伊拉克,使之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韩国统一朝鲜半岛和在2010年前推翻伊朗政权。其次,扩大并巩固核心国家,在2015年前成立亚洲自由贸易区,促使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乐于维护现有秩序、输出安全的国家,2020年前成立亚洲版北约组织;最后,美国2050年前在西半球吸收一些地区成为美国新的州。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尼特的理论颇有几分道理,但总体上说非常狂妄。巴尼特理论最终变成了一个悖论(paradox)——以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断层国家”内部的混乱和专制当然造成了问题(诸如恐怖主义),但是主权原则却是维护国家体系的基础。而巴尼特却全然不顾这些准则,等于公然要构建“帝国秩序”,这必将意味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全面崩溃。在已经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些野心勃勃的西方超级大国曾经试图通过帝国主义来建立世界秩序,但终究是徒劳的,因为霸权必定会在对霸权的反叛中被消解。于是帝国便一个个倒下。面对着历史的惨痛教训,人们不禁要问巴尼特,美国难道会是例外吗?做学问而能融会贯通,最难能可贵,尤其在这个“术业有专攻的时代”。可是,这也是一个偏见过分发达的时代。一个人持一家之言,想来解释整个世界,结果对他的理论和世界均有不利;理论的不利无疑于捉襟见肘,世界的不利无疑于削足适履,对巴尼特的理论也可以如是观。事实上,已经有批评家对巴尼特的理论做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如沃勒斯坦教授指出的,“他(巴尼特)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帝国主义的狂想曲而已”。

历史细节抖落人性密码



《常言道》
——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余世存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胡飞雪

前年,余世存先生推出《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今年,余世存先生再推出《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两书堪称姊妹篇,都是通过搜罗历史上的细节,以历史上的人事、人言,来揭示人性、管窥历史。《常言道》封面有句话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最重要的人,最有价值的言语,近代史所散落的珍珠,全都串联在了本书之中。”这也许是出版社的包装之言,因为,说本书是“散落的珍珠”,固然不错,但若说有什么“串联”,笔者以为,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读者,如果读者有心,能看出名堂,那就能把书中搜罗的“珍珠”“串联”起来。书中《二十五:爱国》一节是这样讲的:1948年,伪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就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讲:“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当了几个月副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以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中国官府自古以来都是高深莫测,只有进入它的高层里层,才有可能看清它到底几斤几两,然而可哀的是,一旦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却又往往叫人大失所望,悲从中来。当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正统儒家济世思想踏入仕途,然而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兴趣全无,晚年只以卖药谋生。海瑞也是类似的命运,他有儒家兼济之志,可他做一县之父母官,平日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他说:“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流,流弊至今,官官真做了一个驿卒(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知府之身亦当驿卒之半,殊失初制。”他还发牢骚:“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海大人不甘心于迎来送往的勾当,当今的公仆干这些却似乎心安理得,不是有公仆大言不惭

地说吗,接待也是生产力!杜甫不能济世,即去救人,海瑞不能济世,就辞职不干,去独善其身,当今的公仆倒好,处心积虑杜撰一些歪理邪说,欺蒙世人,真是恬不知耻。书中《二十六:猖狂》讲的是文史大师钱锺书先生。钱先生一贯婉拒新闻界采访,也拒做寿搞Party,也不参加什么会议,他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钱先生眼光端的是犀利无比,他把世事看得太透了。会议是公共活动,是政治伴生物,但许多会议确实叫人不敢恭维。有人这样描述概括机关里的会议:“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二,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不言不语,五六七八九把手,只做笔记不开口。”手中有无真理,以及真理多少、话语权大小,完全取决于手中是否有权力,以及权力的大小。还有人这样说今天的会议:“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开会几乎沦为表演。还有人调侃,说只要会举手,会拍手就可以参加什么会议。书中《二十九:气度》讲民国旧事。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大头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下以为,近代中国政治比之古代中国政治进步的地方,在于近代玩政治的人比古代玩政治的人少撒了一句谎,古代政治人物在做政治宣传的时候,总是先自称自己代表天意,其次才自吹自己代表民心,近代政治人物则不同,近代政治人物删繁就简,只称自己代表民心。袁大总统和蔡先生是在一条河里洗澡,彼此都深知对方,他们如果太啰嗦,只能叫人认为太无聊。可叹的是,人随王法草随风,近代影响到了现代,自吹代表的歪风影响所及,社会各阶层无不深受其荼毒,比如有时候你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节目,冷不丁地,从天而降的节目主持人会说:我代表全国电视观众向你问个问题,或云我代表亿万观众向你表示感谢。代表,代表,代表,谁知道你代表了什么,代表,代表,有多少罔顾民意的东西假汝之名大行其道?手捧《常言道》,边读边想,思接书里书外,视通近代当代,不禁感慨万端。

新书过眼

《市场波动》



罗伯特·希勒 著
文惠桥 卞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罗伯特·希勒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他早时候出版的《非理性繁荣》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本《市场波动》提出了一种关于投机性市场上价格波动的原因,并具备大量统计证据支持的开创性理论。这个理论通过强调公众舆论或心理因素在价格波动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理论向解释资产价格标准的有效市场模型提出了挑战,并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集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有详细研究。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罗伯特·希勒和约翰·坎贝尔等学者共同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金融杂志》等著名期刊上的论文。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著
冯钢 刘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这部关于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著作,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论述完全对立,在后冷战时代同时被知识界关注。本书作者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公认的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地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他对工业革命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且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后果;正是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市场心理(market mentality)”导致了自由的毁灭和社会的解体,以功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而形成的药方为基础建立的经济体系,从总体上说不可能成功,因为奠基于个体的获取动机(gain motive)和对饥饿的恐惧之上的“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揭示出,作为市场体系基础的制度结构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

《无国界的世界》



(日)大前研一 著
黄柏棋 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商业领袖在管理过程中必须去除不合时宜的本地化思考模式,大前研一在本书中首倡的“无国界管理”已经成为众多跨国企业竞相采用的流程。“我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大前研一在不同场合一再宣扬,而在无国界的世界里,企业首先应当放弃对公司主义的盲目追求,如果被错误的战略引导,即使再努力,也会因南辕北辙而适得其反。要求具有全球化的视角,就是要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作为全球性的选手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对于世界主要市场务必做到烂熟于心,而不是纠缠于本地市场这一方狭小天地。当然,国家和货币必须成为无国界的世界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因为当一国贸易政策突然改变,外汇汇率震荡不已时,再完美的战略也可能血本无归。本书提出的企业迈向全球化的“五步走”战略,为中国企业思谋已久的“走出去”提供了极佳的战略指导。